觀察

THE OBSERVER

儲安平主編

INDEPENDENT NON PARTY · THE OBSERVER

第五卷第十四期

專論

幣制再變革與物價前途　徐毓枬

論金幣鑄造與修正　劉滌源

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　夏鼐

紐約通信

杜魯門的勝利就是華萊士的勝利　何永佶

邱吉爾的投降主義（外論選譯）　新政治家

觀察通信

徐淮戰局的變幻　觀察特約記者

徐蚌會戰的分析　觀察特約記者

美國在華還能做些什麼（爐邊天下）　費孝通

圍城與"Tom Jones"（書評）　林海

幣制再變革與物價前途

徐毓枬

自從限價政策取消以後，金圓幣制一定要變，這是大家都料得到的。變的途徑，亦未出人意外。筆者在一個月以前，曾經寫過，金圓幣制已面臨最嚴重危機，一切正常補救辦法，都嫌緩不濟急，目前需要一二針強心劑，并預測強心劑大概採下列二方式：

（A）把以前收兌進來的金銀美鈔，再出賣給人民，價格則定得高些（例如每美金等於金圓八元）……

（B）立即宣佈金圓爲兌換紙幣，於一二月以後，以銀兌換；金圓之金含量雖規定，但銀含量未定，故兌換比例仍可另行規定。

筆者還說這是飲鴆止渴的辦法，不過政府也許會走上這條路，正好像以前大家感覺到改革幣制不足以解決問題，而政府却又非改變幣制不可（參閱拙作「物資與幣制善後」，新路週刊，十月十六日）。

十一月十一日之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以及修正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不幸未出以上兩點所料，祇是貶值之程度更加深，貶值之事實更赤裸裸：政府并未在名義上維持金圓之金含量，而是明令把金含量減爲原含量之五分之一。本文目的在推測兩點：（一）變之邏輯，（二）變之可能後果。

先說第一點。金圓券發行倉促，券面竟無「金」字，而且對於收兌金銀外國幣券而付出的金圓券，亦未事先爲之妥籌出路，因此雖然在極短時期內，人民暫存觀望，物價得告暫時穩定，但等到人民一發覺政府并無較根本辦法時，對於金圓之一點微弱的信心便失去，演成黑市搶購等混亂局面。要挽救金圓幣制之全面崩潰者，一定面臨兩個課題，如何使人民相信金圓券？如何使金圓券回籠，以抵銷另一方面之增發？新修正辦法之設計人，當然也看得到想得到這淺顯的道理，不過設計人不敢、不能、或不肯想根本的辦法，於是想出這一條阻力最小的路：把金圓券變爲對內兌換紙幣，而且就利用人民對紙幣之不信任心理，希望金圓回籠。這句話需要解釋一下：

金銀外幣復准持有是一個必要步驟，新辦法之重點，是在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之第三條及第十一條。第三條是說，你們不要慌，金圓券即將以金銀分別鑄造，與金圓券平行流通。第十一條是說：如果你們還要心慌，等不及，那你們可以出雙倍價格，由政府即刻把金銀賣給你。當然，依字面解釋，第十一條之意義并非如此，而是一半作爲一年定期存款，照章計息，另一半則依法定兌換比例，兌換金銀；但在目前局勢，目前情緒之下，不論有無合理根據，恐怕沒有人會傻到作一年定期存款。故以上「翻譯」法，想與設計人之原意不悖。如果這種解釋是對的，則政府出賣黃金之價格爲每兩二千金圓券，而收買黃金之價格則僅爲每兩一千金圓券。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民自難相信金圓券之黃金價值曾不再貶值，故如果黃金仍爲人民持有財富之對象，則人民祇有向中央銀行購買黃金，而沒有人願意把黃金等售於中央銀行，故金圓券祇有回籠。

這套邏輯未始不言之成理，在指出這套邏輯之可能漏洞以前，先問一問，這些黃金銀幣等將從那裏來？大家知道，這些金銀就是以前收兌進來的東西，這裏要指出，這一進一出之間之獲利之厚。據政府自己發表的數字，政府約收進價值美金一億五千萬元的金銀外國幣券，共兌出金圓券約六億元，現在金圓券之表面的貶值爲五分之四，但以政府出售金銀之現貨價格而論，實際貶值爲十分之九。故若以收兌進來的金銀美鈔（美鈔可換成金銀再出售）脫手，即刻便有六十億金圓券回籠。如果目前發行額爲二十億元，則祇須將收兌進來的東西，脫手三分之一，金圓券便可全部回籠，淨餘三分之二。這是「取之於民還之於民」的現實解釋！

現在要說到幣制再變革之效果。在現在這個時候，事態瞬刻改變，一二個月已是很長一段時間，而且新的因素時常加入，超過經濟因素之重要性（例如開放限價以後，照經濟上說，因爲觸犯限價規章之風險因素已去，故物價應當稍跌，而事實上反漲，而且漲率空前，十天之內，上漲率超過十倍，這是因爲心理上大變，大家都想存些物資，準備緊急狀態之來臨），故預測極難正準。雖然如此，我們還不妨冒險一試，不過時間要限得極短，至多是一二個月。而且所謂效果，亦專指對物價水準影響而言。

（一）如果人民不相信金圓券，可是還相信金銀，趁現在金銀可以持有，中央銀行還出售金銀之時，雖然吃虧，還是忍痛向中央購進——如果這樣，物價水準可以平穩一些。平穩不是不漲，因爲金圓券固然一方面要回籠，但超支之基本原因未去，故他方面仍在放出。控制區愈小，搜購物資之範圍愈狹，物價亦有上漲之勢。

（二）如果人民既不相信金圓券，亦不相信金銀外幣，認爲在現在這個時候，金銀饑不能爲食，寒不能爲衣，趁政府尙未再宣佈持有金銀爲違法，而且還肯收進的時候，趕緊脫手，換爲金圓券，再即刻換成物資，作一些緊急準備。如果是第二種反應，則物價漲風將如火上添油，市場上又淨增加了一大批購買力，來搶囤物資。

這第二種反應并非不可能，限價取消以後而京滬物價反而猛漲，便是反常心理之結果，有此反常心理，便可能有此第二

種反應。新辦法設計人沒有想到這種可能性，乃是新辦法之一大漏洞。稱之爲漏洞，是「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說法，也許新辦法設計人早已看到想到這點，不過他們另有高見：『如果你們來購買金銀，則我出極小「代價」（簡直不能說有代價，因爲以前低價收兌進來的金銀，可以應付此種需求而有餘）而收穩定物價之效。如果你們既不來賣，又不來買，則祇是現狀之繼續；我亦沒有虧本，你們也不能把物價上漲之責，推在幣制再變革身上。如果你們眞再把金銀外幣賣給我，搶囤物資，物價漲風固然是如火添油，但我也因此而又撈了一筆外匯資源。管它以後怎樣（after me, the deluge）！』我眞希望這些設想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不幸而設計人而眞有這種想法，則夫復何言！夫復何言！

關於物價漲風之地域公佈及先後次序，似乎亦可得而言。凡一地人心安定，認爲軍事威脅之可能性不大，則第一種反應比較或然，故該地物價要比較平穩。反之，如果某地大家都預測有某種重大變動而又不敢確定過渡時期將延續多久，則人心惶惶，朝不保夕，都想存些物資以求倖免。在這種地區，第二種反應成爲可能；或雖無實際的第二種反應，但因大家（包括商人）都存同一看法，會形成物價漫無止境上漲而交易額甚小的局面。物價之新漲風亦必發動於此。當然，如果二地在貨幣及交通上還有聯繫，則一地之漲風必波及他處。未來漲風在何時何地發動，可作爲該時該地之政治氣溫表看。

以上專就心理因素立論，而未涉及更基本的因素，例如物資問題之眞正缺乏，或財政赤字之不能彌補等等，因爲這些或已成爲家喻戶曉的常識，或已被強調，故此處從略。

論金幣鑄造與修正

劉滌源

十一月十三日

我國十年通貨膨脹史中，經濟情勢日益嚴重的癥結，在於政府未曾強制有錢者出錢，致財政收支不能平衡，因而以增發鈔票爲籌措戰費的主要工具，使物價水準繼續上漲。這時期中，政府關於財政金融諸方面所公布的法令、辦法、及方案，數目很多，前後頗多錯綜變化；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即一方面無魄力、無決心、與無能力運用大刀闊斧的方策，去實行「有錢出錢」以根絕通貨膨脹的洪流，而另一方面却採行一些不關痛癢的枝枝節節的辦法。遠之如黃金拋售、票據不准抵用等，近之如八一九金幣改制，及十月三十一日的「補充辦法等」，都是如此。把截斷通貨膨脹洪流的主題擱開不談、或輕輕帶過，而要用次要的枝節方法去解救這病入膏肓的重病，實無異於「緣木求魚」；結果不僅空費氣力，無補於事，而且治絲益紛，使事態日形嚴重，演成當今不可收拾的危殆局面。

一　修正辦法之要點

病急亂投藥：八．一九金圓改制與限價政策收到適得其反的惡劣效果；十．三一取消限價的「補充辦法」後，全國各地物價狂漲，京滬搶米風潮澎湃洶湧，情勢之嚴重爲民國史上所僅見。新財政部長徐堪上台後，又由行政院於本月十一日通過一套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及修正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希望對當前經濟危機有所挽救。此種辦法仍未改變過去「萬變不離其宗」的基本精神，並未採取確實而有效的辦法去截斷通貨膨脹洪流，而只規定下列數項：（一）由政府鑄造金幣發行，使紙幣同時流通，（二）以高於官定兌換率一倍的金圓券存向中央銀行兌換金銀幣，同時中央銀行將該金圓券半數列爲該兌換人一年以上之存款，（三）金圓券發行最高限額取消，其發行額由政府隨時以命令定之，（四）金銀外幣兌換率調整，使發行準備中之金銀與外匯，可折合爲更多的金圓券，（五）准許人民持有金銀外幣，並許銀幣流通買賣，及（六）進出口貿易採連鎖制。

上述六項辦法中，第一項在字義上確定硬幣與紙幣同時流通，本位制度表面上與第一次大戰前歐美所行金本位相似，但却未具備其實施成功的條件。第五項規定人民可保有金銀外幣，且可買賣銀幣，算是轉了一百八十度的後轉灣；這種新措施可以說一方面是第一項必然的副產物，有了第一項規定後，此項規定算是「應有之義」，另一方面也是政府經濟管制失敗後，對民間廣泛行使銀幣一事加以遷就，這一項可算是比較能順應民情與避免紛擾的辦法。第六項進出口貿易採連鎖制，出口商所得外匯，可由其自己處理移充進口貨物之用；此點算是結束了政府過去用低廉官定匯率剝削出口商的剝削作爲，同時使官商間有微妙關係過去可在「官定匯率」烟幕下獲得便宜外匯的進口商，也不再如過去那樣容易獲得暴利，這一點也可算是比較合理的辦法。第三第四兩項則爲取消紙幣發行最高限額，並貶低紙金圓的價值，使今後紙幣發行可以隨意增加，解救政府財政上的困難。

第二項旨在以「兌換金幣」爲餌去吸收一部分泛濫於市場上的鈔票，可算是政府對人民十足的如意算盤。據估計，金圓改革後政府收兌金銀外幣約一億九千萬美元。人民依當時兌換率：銀幣二對一、黃金二百對一、美鈔四對一、將金銀外幣送到政府手中，換得紙幣；現在，曾幾何時，人民要向政府手中買回這些金銀外幣，却需付出十倍於當時兌換率的現鈔。這現鈔的半數名義上可換得中央銀行一年以上的存款，但一年以後的局勢如何，大家都能心照不宣，所謂「存款」實近於送禮。政府對金銀一收一放，時隔數十日，即市利十倍，誰能否認政府不會「生財有道」呢？又金銀官定兌換率較原有者僅增五倍，即在此辦法公佈後，人民有金銀賣給政府，所換得之金圓券，與人民向政府用上述長期存款辦法換取金銀時所付出之金圓券，兩者比較，相差幾乎爲一與二之比；例如，人民有銀幣一元請求政府收兌，只能換得金圓券十圓，而人民要向政府換購銀幣一元，則非多付一倍的金圓券數目不可。在同一時間內，金銀收進兌出，市利十倍，可謂「生意經」之能事。政府在這方面賺了錢，算是「所得是實」，但政府法令之出爾反爾，變幻莫測，令人無所適從，故政府所得者爲金銀收兌與換出之金圓券差額，所失者爲無法補償的威信。

二　金幣與紙幣同時流通

現在各國貨幣制度殊不一致，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在國內市場中不再有金貨本位幣流通，而以中央銀行之紙幣充無限法償（unlimited legal tender），對內成爲

不兌現紙幣。在財政制度健全，財政收支平衡的國家，政府不會用大量發鈔爲彌補預算的工具，本位幣雖爲紙幣，不能兌換，但仍行之甚善，不需用金幣與紙幣同時流通的辦法，來維持其貨幣的信用。我國民二四年冬法幣改革後迄抗戰初期，並無硬幣與法幣同時流通，並未因此損害法幣的信用，卽爲實例。

相反的，假如政府繼續大量增發紙幣，則縱然有硬幣與之同時流通，如政府硬要維持二者間之官定比值，結果會使硬幣終告隱藏，無法使硬幣永遠與紙幣同時流通。硬幣雖爲貨幣，但同時可熔鑄而成爲貨物，在繼續通貨膨脹中，勢必使硬幣與紙幣間之官定比值，與其市場比值相乖離，且使乖離之程度愈來愈大，徒增紛擾。金圓改革後，政府曾擬鑄造並發行輔幣，但因輔幣之市場價值較官定價值爲大，換取者可獲大利（據說用十元金圓券換成十元輔幣，可賣三十五元金圓券），擠兌甚厲，硬輔幣兌出後卽告隱藏，結果被迫停止發行，此爲實例。此次修正辦法中兌換金幣或銀幣，雖規定需付倍於官定兌換率之金圓券，但金幣與紙幣二者間之官定比值與市場比值，無法保持等價，且會隨時變異，實增加金融上不必要的紛擾。

修正辦法中規定政府鑄造金圓券本位幣，與金圓券同時流通，與金本位制相似。但是，眞正的金本位制以自由鑄造、自由兌現、自由熔毀、及自由輸出輸入爲基本前提。藉此基本前提，經過國內與國際兩種自動調節過程，使金幣之實質價值與名目價值趨於一致，貨幣數量因而能保持於最適度之狀態。我國此次修正辦法並未規定人民對金幣有此種種自由，故在實際上無法收到自動調節使貨幣數量趨於適度之功效。另一方面，紙幣發行之最高限額，主要基於財政的目的而加以決定，與金本位中紙幣發行之基本原則不符。所以，規定鑄幣與紙幣同時流通，在實質上並非金本位制。

此外，還有許多重要的問題有待解決：第一，我國不是產金國，存金量也並不如何豐富，鑄造金幣，究竟準備鑄造多少？假如數目不多，則市場上通貨主要由紙幣所構成，少數金幣混雜其間，僅屬一種不必要的陪襯而已。假若鑄造數目甚大，充幣材用之黃金從何而來？第二，政府掌握之黃金有限，現正充紙幣發行準備；用於鑄造金幣之部分增多，則充發行準備之部分卽減少，紙幣發行勢須減少，或不能增加；而戰費之籌措主要靠發新鈔，正需要更多的黃金充發行準備；於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二者卽互相衝突，而無法兼顧。第三，鑄造金圓爲本位幣，法定含金量爲純金四•四四三四公毫，此硬幣「金圓」與紙幣「金圓」究竟有無等價關係？依辦法的字義上看，二者同時流通，當然是價值相等，而且，紙幣「金圓」是硬幣「金圓」的代替品。既如此，金圓券兌換硬幣金圓時應可等價交換，爲什麼要規定以二元金圓券始可兌換一元金圓硬幣呢？當局也許要以強制儲蓄爲理由來辯護，實則其中一年以上存款之近於「送禮」乃爲必然的事；故在實際上，此卽變相的承認金圓券的價值較金幣爲低。這是一大破綻。更不進者，金幣的法定含金量已加固定，假若金圓券因日後發行太多而更形貶值，而且波動甚大，那時政府如何去保持上述金幣與金圓券間二對一的交換比值呢？

三　增發紙幣更方便了

八•一九金圓改革時，規定金圓券最高發行額爲二十億圓。但這次修正辦法把這限額取消，改以命令去隨時變更。這是表示今後發行紙幣不再受最高限額之約束，可因財政上之需要，隨意擴大發行數量。今後增發鈔票比較的更爲方便，此其一。

其次，金銀外幣兌換率調整後，政府所掌握的金銀外幣可折合爲更多的金圓券，則金圓券發行準備基金已無形增加，發行數量也可成比例的增加。今後增發鈔票比較的更爲容易，此其二。

在現階段中，發行準備對於貨幣價值之維持，有下列兩種作用：第一，藉現金準備來限制紙幣的發行數量，防止紙幣的濫發，以增大貨幣之稀少性，使貨幣價值得以維持於較高的水準。第二，利用一般人民對於金銀之傳統的迷信觀念，以現金準備作幌子，來增強人民對於紙幣的信仰，使貨幣流通速度保持於正常狀態，免貨幣價值之跌落。兩種作用中，以前者爲最重要。所以，貨幣價值與現金準備之間沒有直接的關係；現金準備只有通過發行數量，而後可間接的影響貨幣價值。

現在，發行最高限額已取消，而政府現在保有的發行準備，轉瞬之間，因金銀外幣兌換率調整爲原有兌換率之五倍，使金圓券發行額也可增加五倍。今後兌換率隨時調整，十倍、百倍、千倍、……萬萬億倍，則政府可將發行數量依同一比例而增加。這樣，政府手中的金銀外幣之發行準備，有如孫悟空的毫毛，可以千變萬化，成爲無限制增發鈔票的護身符。這樣，名義上，金圓券仍有「十足」的發行準備，但實際上與貨幣學上發行準備之原意，完全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發行準備的原意在於限制發行，而不在於隨時貶值，爲大量增發鈔票開方便之門。

十一月十四日珞珈山

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

夏鼐

這次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一屆院士會議，可算是近年來國內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研究院創辦已達二十年，今年纔舉行選舉院士；原擬選出八十名至一百名，聽說選舉時第一次投票僅選出六十來名。一連投了五次票，纔選足八十一名，可以說相當的鄭重審愼。不管各方面對於這次院士名單的意見如何，（尤其因爲提名的辦法不佳，有些可以當選的學者，根本沒有被提名，以致無從選出，令人頗有遺珠之感），我們如果說，「這一個名單，相當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國學術界的情況。」這話大致不會有多大的錯誤吧。我現在根據中央研究院所刊印的院士錄，試作客觀的分析。

第一，先說年齡方面。我將這八十一位院士依照他們的年齡試作一表。今年是一九四八年，凡是一八八九年生的，今年恰是六十歲。現在將一八八九年以前生的作爲一格，其餘各以五年爲一格；最年輕的是生於一九一一年，卽以此爲斷限。茲列表如下：

	數理組	生物組	人文組	三組合計
一八六三至一八八八年	零	一人	八人	九人
一八八九至一八九三年	十人	二人	十人	二十二人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	七人	十一人	七人	二十五人
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三年	六人	九人	三人	十八人
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八年	二人	二人	零	四人
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一年	三人	零	零	三人

就全體的院士來說，以四十六至六十歲爲中堅主要份

子，佔百分之八〇・三；其中尤其是五十一至五十五歲者爲最多，佔百分之三〇・九。如果分組來說，數理組沒有超過六十歲的，生物組的超出六十歲者僅一位。怪不得有人說，我國派遣代表出席自然科學的國際會議時，人家多是銀髮白髮皤然老翁的前輩學者；相形之下，人家常以小孩子來看待我們。或以爲這是由於我國學者以先天及後天的種種關係，體力遠不及他人，未老先衰，罕享高壽。然而據我看來，主要的原因，還是我們自然科學的發軔過晚。有幾位未到望六之年的學者，不僅是他所專長的那一門學科的現存的最老師，並且往往是這門科目在中國的開山祖師。至於人文組則超過六十歲者有八人之多，幾佔人文組全體三分之一。八位中有兩位是社會科學，其餘六人都是文史科學。這是由於文史科學是繼承清代樸學一系統，已有相當的基礎，並不完全需要向西洋學習後始能開始發達，所以尚有幾位老人作後輩的典型。同時恐怕也因爲這關係，人文組竟沒有一位是在四十五歲以下的學者，五十歲以下的也僅有三位。但數理組及生物組中五十歲以下的都有十一位，生物組中有二位在四十五歲以下，數理組且有三位更在四十歲以下。後者都在數理組數學門，也許像一位數學界前輩說的，數學方面的天才，是比較容易顯露出來，所以天才的數學家，在年青的時候，往往便已有輝煌的成就。

其次，依各院士的出生地，試作省別的統計，列表如下：

省別	數理組	生物組	人文組	三組合計	依所知原籍統計
浙江	九人	六人	二人	十七人	十九人
江蘇	五人	六人	六人	十七人	十五人
廣東	二人	一人	六人	九人	七人
江西	三人	二人	二人	七人	七人
湖南	一人	一人	四人	六人	六人
湖北	一人	三人	二人	六人	七人
福建	四人	二人	無	六人	六人
四川	一人	一人	一人	三人	三人
河南	無	一人	二人	三人	三人
山東	無	二人	一人	三人	三人
河北	一人	無	一人	二人	二人
陝西	一人	無	無	一人	一人
甘肅	無	無	一人	一人	無
安徽					一人
山西					一人

不論依出生地或依原籍來說，都以江浙二省爲最多，二者共佔全體百分之四十二。從前丁文江先生曾寫過一篇中國歷史人物與地理之關係，在東方雜誌二十卷第五號發表（民國十二年），記得也以爲近世人物以江浙爲最盛。我們這次的結果，除江浙佔首位外，其餘當推江南沿海各省及長江流域各省，這是在大家意料之中。但如果依出生地來說，長江流域的安徽省，竟無一人，殊出人意料之外。怪不得胡適之先生想爲他的本鄉掙面子，要依照原籍來算，不必管他的出生地上海市。不過，這樣一來，有好幾位院士都應該同樣以原籍來計算。例如張元濟先生原籍浙江海鹽，生於廣州市；湯用彤先生原籍湖北黃梅，生於甘肅；李方桂先生原籍山西昔陽，生於廣州；俞大紱先生原籍浙江紹興，生於南京。不過，這次院士錄中，除胡張二先生外，都僅塡明出生地，不兼註明原籍。據我所知道的，既已有好幾位，其餘漏列的一定也還有。上面表中末項雖依照知道原籍的幾位，另作一表，但因並不完備，所以下面的討論，仍以錄中所載的出生地作爲根據。

出生地在江蘇的十七位，都在長江以南的各縣，計上海市及武進各四人，南京鎭江金壇各二人，蘇州青浦奉賢各一人。浙江方面，也集中於沿海及太湖流域。如果以浙江舊分的十一府來說，杭州計佔四名，其餘爲寧波溫州各三名，紹興台州各二名，嘉興湖州金華各一名。廣東省集中於廣州市（四名）及新會（三名）。福建湖南都集中於省會，福建六人中四人生於閩侯，湖南六人中五人生於長沙。其餘各省比較分散，沒有這樣集中，每縣市不管他是否省會，都只有一名。

其次，說到學歷方面，除了人文組有六位未曾到過外國受西式的教育以外，其餘都曾出過洋。茲將留學的國別，列表如下：

國別	數理組	生物組	人文組	三組合計
美國	十七人	十七人	十五人	四十九人
英國	三人	四人	二人	九人
德國	三人	一人	（二人）	六人
法國	二人	一人	二人	五人
比國	一人	一人	無	二人
瑞士	一人	無	無	一人
日本	一人	一人	三人	五人

就上表而論，以留美的爲最多，佔全體院士百分之六〇・五。其次爲英德法及日本。人文組有兩位留學過他國後又在德國研究，所以在上表中雖塡入德國一項下，但另加括弧以示區別。表中留歐的比較留美的爲少，這和留學生人數的多寡有關係似乎是成比例的。但是我國留日的學生，在數量上恐遠超過留美學生，但是在院士的百分比卻很低。這大概由於留日的多在受過大學教育後便返國，很少仍留日本進畢業院獲得較高學位。在上面表中數理組二十八人中得有博士學位者二十五人，碩士學位者二人，實習者一人；生物組二十五人中得有博士學位者二十人，碩士學位者二人，餘三人未詳；人文組留學歐美的十九人中得有博士學位者十三人，碩士學位者三人，餘三人未詳。博士或碩士學位，並不見得和一個人將來在學術的成就有什麼必然的因果關係。但是在導師的指導下，做過一番比較狹而深入的研究工作，多少總可使之領悟到研究工作的性質和途徑。如果返國後有適當的研究環境，加以個人的努力，自然容易有所成就。

至於國內所受的教育，六位人文組的從未出國受西式教育的院士，四位是前淸科舉中出來的（進士、舉人、廩生各一人，一未詳），兩位是國立大學本科或研究所（卽畢業院）畢業的。至於出洋深造的院士，在未出國以前所受的國內教育，因爲院士錄中多未塡明，所以無法做完備的統計，現在只好將錄中已塡明的摘錄出來；連同上面所說的未曾出國的六位，合併作爲一表。又如果原錄中註明連大學本科教育也在國外受的，這表中也收進去，依國別另成一項。所得的結果如下表：

	數理組	生物組	人文組	三組合計
淸華	三人（又研究所二人）	四人	五人	十二人
北大	二人	一人	四人	七人
東南	四人	一人	〇	五人
南開	二人	一人	〇	三人
唐山	二人	〇	〇	二人
金陵	〇	二人	〇	二人
復旦	〇	二人	〇	二人
他校	二人	三人	〇	五人
科舉	〇	〇	四人	四人
美國	三人	五人	四人	十二人
日本	一人	一人	二人	四人
英國	〇	〇	二人	二人
未詳	九人	五人	七人	二十一人

這表不很完備，未詳一項達全數四分之一，所以統計結論的價値較低。但是也可以大概的表示國內學籍的分佈情形。國內各校，以淸華出身的爲最多。我想如果將未詳一項下的各位及美國大學本科畢業的各位，都查出他們在

國內的學歷，恐怕大半是清華出身的。清華從前本是留美預備學校，本篇上一節已述及院士中留美的達四十九人之多，所以可以斷言院士中清華出身的決不止十二人。至於各組分佈的情形，就已經知道的而論，清華比較平均，三組都有好幾位。北大以人文組見優，數理組二人都屬於地質學，生物組的一人屬於心理學。東南（卽中央大學前身）似限於數理及生物二組。唐山限於數理組，同組的所謂「他校」，是交通及同濟各一人。金陵（農學）復旦（心理學）各二人，都限於生物組。同組的所謂「他校」，是協和，湘雅（皆醫科）廈門（魚類學）各一人，前清科舉出身的，都限於人文組。這表中所未詳的太多，將來查清楚後，需要修正的地方一定很多。但是我想縱使有些小出入，大致的情形，不會相差太遠。

最後，就現在職務的分佈來說，各院士所服務的機關，可列表如下：

	數理組	生物組	人文組	三組合計
中央研究院	八人	八人	五人	二十一人
北平研究院	二人	〇	〇	二人
北大	四人	三人	三人	十人
清華	一人	三人	五人	九人
中央	二人	二人	〇	四人
浙大	二人	二人	〇	四人
輔仁	〇	〇	二人	二人
其他七校	一人	二人	四人	七人
國外大學	〇	〇	二人	二人
文化機關	二人	一人	一人	四人
技術機關	二人	四人	〇	六人
工商業	一人	一人	一人	三人
行政長官	二人	〇	二人	四人
其他	〇	〇	三人	三人

中央研究院的竟佔百分之二十六，怪不得向覺明先生說：「本院的所長，大部分的專任研究員，幾乎都是當然院士。」以為「令人有一種諸子出於王官之感。」（見北平版中建一卷六期，視南北兩學術會議）查中央研究院現有十三所，其中十一個所的所長被選為院士，所佔的比例確是大。但是如果我們假定中央研究院設立每一所時，是認定這一所研究對象的學科，在中國確已產生有專長於此的權威人物否則寧缺毋濫；又如果中央研究院所延聘的所長，確實便是這一種權威人物；那麼，各所長幾乎全體被選為院士，毋寧認為是一件當然的事情。不過，事實是否如理想上所假定的那樣的美滿，那是另外的一件事，至於專任研究員（兼任的及副研究員都不算在內）中央研究院現下共有六十八名，這次被選為院士的，共計九人，僅佔百分之十三，似乎不能稱作「大部分」。中央研究院的所長和專任研究員，因為「近水樓台」的關係，他們的工作和貢獻，院中同人自然比較熟悉。又加以人類到底是感情的動物，朝夕相處的熟人之間多少有點「感情」的關係。所以同等成績的學者，也許是院內的人比較稍佔便宜。為着「避嫌疑」及延攬院外人才起見，也許須要採取一種政策，如果遇到有同等成績的學者，優先推選院外者，以表示禮貌（Courtery）。但是此後的選舉權是操於院士會議之手，僅佔四分之一的中研院中人，並沒有完全的決定權。向先生提出這一點，可以供給中研院內負責推選院士者的注意和參考。

上面的表是根據今年春間的調查，現下經過了半年多，職務當已有好些更動。但是至少可以代表春間被選時各院士的職業分佈。其中最多的是大學教授，共三十八人佔百分之四十七。這些教授中有六人是以大學校長的資格兼任教授。依學校的分佈，以北大（十人）清華（九人）為最多，其次為中央及浙大，各為四人。這和上節所說的各院士國內讀大學時學歷的情形，正相呼應。那一個表中，也以北大清華東南（卽中央的前身）為最多。浙大創辦較晚，畢業出來的人才尚未能有所表現。一個學校中師資的優劣，和他所造就的人才，自有相當的關係。此外輔仁有二人，國外大學也有二人，都是人文組的。其他七校是武大，川大、湖南、山東、復旦、台大、和社會教育學院，每校一人，這都是暑期前的情形。暑期是教授聘約更換的時間，現下當已不同。至於文化研究機關，國內甚少。所以除了中央研究院外，只有北平研究院和地質調查所各二人，靜生調查所及國學圖書館各一人。所謂技術機關，數理組是礦產測勘處和橋樑工程處各一人；生物組是醫院或實驗院共四人。工商業方面，在中國因為工商落後，很少利用高級的專門人才。所以只有化學工業公司，製藥廠研究所，及銀行顧問各一人；其中製藥廠還是美國人在美國所辦的工廠。可見得中國工商業和研究工作人員，很少取得聯絡。因為幼稚的工商業，並不需要或無法維持一個規模宏大的研究室。至於行政官，因為表中將兼任文化機關職務的都算到文化機關中去，所以剩下來的僅有四人。如果連兼任的也計算在內，行政官也僅六七人。不僅人數不多，並且他們所以當選，並不是由於做官的煊赫，實是由於他們在學術工作方面的貢獻。末了一項「其他」是包括兩位年逾八旬的老者，僅担任學校或公司的董事長的名義，和一位僅填「自由職業」的。這三位都是人文組的院士。由於各院士職業的分析，可以知道絕大多數是仍在繼續做學術的工作。在今日的國內情形之下，誰都知道做學術工作是非常困難的。最近北平各大學及研究所，不是為了生活的壓迫，實行罷教，罷研，和總請假麼？院士們大部份是大學教授和研究所人員，便是感受這生活壓迫最甚的人。雖然學術界中人，大多能忠於所學，不肯輕易的離開他們的崗位，但是在妻兒啼饑號寒的環境下，教人如何能埋首研究以求產生偉大的成績？教人如何能專心教誨後進以求造成下一代的學者？縱使是教者諄諄善誘，有心想要帶出幾個徒弟來，但是優秀有為的青年有幾人肯再踏覆轍，走上純粹學術研究的途徑？中國學術的根基極淺，尤其是自然科學可以說剛是萌芽。如何能使政治經濟上軌道，使這嫩芽不致為缺乏陽光和雨露而枯萎，這有賴於我們今後的努力。

卅七年十一月四日寫於南京北極閣下

杜魯門的勝利就是華萊士的勝利

何永佶

一九三二年七月三日，羅斯福總統競選時對美國的選民說：「我現在答應你們——我還答應我自己——將要給美國人民一個新政」。十六年後，同月的十五日，杜魯門總統競選時對美國的選民說：「我們現在的口號與一九三二年的口號並無不同，是個新的新政（New New Deal）」。

憑着這「新的新政」，杜魯門在全世界料想不到的情形下，得到美國選民票數的多數，打倒共和黨的候選人杜威而繼續做白宮的主人，這不能不歸功於故羅斯福總統的「蔭庇」。從前拿破崙第三競選總統時，有一投他選票的法國人說：「我的鼻子曾在莫斯科凍裂過」，意思是說拿破崙第一的威望遺風，猶可「蔭」着他的侄兒，擡之上居

大位。今美國故羅斯福總統在位十三年，雄猷新政，德在民，杜魯門倚此蔭庇以上台，乃倡言「新的新政」。為甚麼「新」的新政呢？原來在其第三第四任內，故羅斯福總統已為戰爭及國際問題纏繞到不得開交，無暇推行其新政，此蓋已寢息八年矣。今杜魯門競選，把這蓋上塵埃的寶鏡拂拭一下來向選民一照，居然得到一般人料想不到的奇果，（筆者雖曾在今年二月十七日滬大公報上向國人報導過「杜氏的資望從低點往高點爬，而其政敵則從高點往低點落」，然亦未想到杜氏能有這次如此的多數。）蓋直接得力於其政治顧問克理福（Clark Clifford）的競選戰略，而間接得力於華萊士進步黨的政綱之淬礪。今試把杜氏競選時所作的新政諾言，集合起來有以下各點：——

（一）社會安全設施（Social security 即人民就業、老年等等保險）。

（二）勞工集體議資（即准許工人以罷工及其他手段獲得合理工資），勞資關係改善，及最低工資之規定。

（三）政府大量助民建屋，及嚴格管制房租。

（四）對農民置產、耕作、及銷售等等，政府予以財政援助。

（五）電力公有（即龐大電力公司，如TVA不許私家電廠經營，俾民衆能獲便宜的電力動力）。

（六）申令民族權利平等（即禁止美國國內白黑人種待遇之不平）。

（七）改善租稅制度（即加重富人及大公司的所得稅，減輕中下等人家的所得稅）。

（八）廢除現下的 Taft-Hartley 勞工法，恢復一九三五年故羅斯福總統新政時代的 Wagner 勞工法。

以上幾點，均係華萊士倡導的東西，杜魯門拿過來而得勝利，直不啻華萊士的勝利。唯一杜魯門未從華氏手中口裏拿過來的是與蘇聯言好的一點。在這競選中，杜氏難得談到外交國際問題，其藉以取得選民歡心者，是他關於內政的甜言。美國民衆生活舒適，年來經濟繁榮，花天酒地，只有看得遠一點的人才會因對蘇政策之缺乏成績而欲改換政府，一般人只要他能在現存政權下喝個醉吃個飽，便不想國境以外的問題了，便對於更換政府之一事提不起勁了。華萊士是個遠見之人，競選時斤斤以外交國際問題為言，他一談到美國外交問題，便不由不談到蘇聯問題，一談到蘇聯問題，華萊士便勸美國人先要反躬自省，說美國政府對蘇的舉措如何如何的不對。他其實只是向美國人倡導中國人的恕道，但因為他「恕」蘇聯卻被人誤認為共產黨的同志，美國人一聽到有人要共他的產，莫不談虎色變，美國四十八州中有六個州不許他競選，其中有一個州竟與華萊士打官司打到最高的大理法院，而最高法院判該州得值。所以華萊士的思想及政綱，在杜魯門口裏發生了效力，在華萊士嘴裏，卻因為摻雜了外交成份，便沒有那麼靈了。（話雖如此，仍有些人以為杜魯門在競選中出主意派大理法院首席推事文遜 Fred Vinson 去看史太林，為一種愛好和平的表示，因此而得到許多的選票：這話無從證實，誌之以備參攷。）

我想比和平手勢還多重量的，是美國勞工界的擁護。「這是勞工界幹的！」（"Labor did it"），杜魯門總統這樣說。平心說來，勞工界也不是怎樣特喜民主黨，而是特憎共和黨。為甚麼呢？因為這幾年來美國給勞工不便的法律，均是由共和黨所控制之第八十屆議會內的共和黨議員提出而通過的。譬如 Taft-Hartley 勞工法便是由兩個共和黨議員，鑑於煤礦工人在督易斯領導下總罷工之可怕，提出而「轆轤」（RAILROAD）通過的，此法曾經杜魯門總統否決過，但為國會三分二之大多數再通過，便成了管轄勞工之大法。這法卻給了勞工界許多不方便，譬如勞工界多有規定僱主只能僱用屬於該廠工會的工人（這叫做 Closed Shop），而這法卻允許僱主可僱用工會以外之工人，這便取消了該工廠之工會的議資利器。又譬如有些工會雖可答應僱主可以僱用不屬於該工會的工人，但在僱用後的一規定期限內此種工人必須加入工會（這叫做 Union shop），而這條法律允許這種後來之工人自己自由決定加入或不加入，這便令一工廠內之工人集團難以團結起來對付僱主。此法命令工人簽字宣誓自己不是共產黨員，而不要僱主作同樣的宣誓。此法又給予法庭甚大權力禁止勞工罷工，前年煤礦工人罷工即是由法庭命令禁止的。凡此種種，此法都是便利僱主，而不便工人，換言之，即是令到工人少得入息。美國人看荷包是看得很重的，動一動他們的荷包，他們便視若仇讎，而這是共和黨幹的，他們便集中力量來反共和黨的黨魁杜威。但不選杜威，選誰呢？華萊士無疑地是愛護勞工的，但經過了美國資本階級的工具（如報紙廣播電台等等）之宣傳，又經過美國共產黨公開決議擁護華萊士，這個人早已成為問題人物。而美國勞工界並不怎樣想國際和平問題，又不怎樣希望把美國政權拿在自己手裏（如英國的工黨）。他們的平庸願望，只願意看自己每月收入多幾塊錢，生活多舒適些，便認為已足，不必還管歐洲遠東問題；故除了杜威外，他們覺得唯一可投票的是杜魯門，而且此人曾經否決過上述之不便於勞工的法案。

杜魯門的選上，證明搞近代政治的必須為實際工作的人打算，然後始能有前途。杜威之所以失敗，正因其代表着一班擁資自固、養尊處優的人，無論其在報章電台上說得如何天花亂墜，終不能愚弄人民於永久，不但杜威落選，連國會內共和黨的候選議員，凡曾舉手贊成限制勞工法令者，均一一落選，以致今日美國上下議院均落在佔多數的民主黨手裏。這一串的事實證明三點：（一）美國的報紙廣播、雜誌、民意測驗等等凡需要大量金錢才辦得起來的傳聲筒，現在已不足代表真正民意；（二）美國民衆不是完全是傻子，不致為上述由金錢控制的主意製做機關所愚；（三）美國這部政治機構——大選——仍可用以反應真正民意，而以和平、不破壞、不打仗、不弄到人人貧窮的方法出之。

中國現有的中央政權，在其素質上，在其所代表的階層利益上說，當然是贊成杜威的，這無足為怪。且因杜威曾發表過一篇演說，指摘杜魯門援華之不積極，國內的袞袞諸公，便日夕向上帝祈禱杜威勝利，而驅着一班衣服襤褸杜威看不上眼的小孩子、叫化子扦着木牌，在中國為杜威作政治宣傳，恭祝「杜威好運」。很可惜，上帝並未聽見我們政治要人的祈禱，杜威亦未嘗向我們的要人說半句「謝謝」。今杜威落選，而杜魯門上台，這自然是對於國內那班人一大打擊；但容有尚不肯心死而祈禱杜魯門大量援助現在中國政權者。抱那個佛腿不靈，也許抱抱這條佛腳會靈。其實關於援華，杜魯門無多大意見，意見都是外長馬歇爾供給的。馬歇爾本來不是不要援華的，他在中國調解時猶要求美政府把借錢給中國的大權交給他，庶他可用以引誘國共雙方來言歸於好，可見他對於中國本無惡意。惟自從二年前他回美國任外交部長後，對於援華即不大感興趣。關於這，與其怪他老人家，不如怪我們貴國政府，在他在中國時給他的感想太多了。後來的四萬萬援華款，不是他建議的，而是國會的共和黨議員，在援歐法案內硬加進去的。現在國會不由共和黨操縱，而總統仍是杜魯門，外長仍是馬歇爾，援華之一事能有多大速度，不問可知。前不幾天，上議員勃里奇（Sen. Bridges）公開要求杜總統立刻開國會討論援華事，杜魯門今日給他以「不擬接納」為答。但國會明年正月就要開會，到時必有人提議大量援華，那時亦必有些議員（包含些民主黨議員）贊成。但那時援華案通得過通不過，及即使通過是否太遲，等等問題，那就要到時才有個分曉了。

十一月十五日於紐約

邱吉爾的投降主義

"Mr. Churchill's Defeatism",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Oct. 16, 1948.

邱吉爾在蘭杜諾（Llandudno，今年英國保守黨舉行年會的所在地——譯者註）的演說，其重要是在它的徹底的投降主義。他相信我們今天必須盲目地接受美國的政策，像他在大戰期間曾這樣做一般，無論那些政策是對或是錯。在三年中間，美國從反德意志主義的一個極端變換到反共產主義的一個極端，從相當天眞地以讓步爲手段有意媚求於史達林，而到一個同樣不可靠的企圖，用原子彈予史達林以當頭打擊。正當英國政治家應以運用壓力與阻止美國過分的歐斯底里亞爲最大職責的時候，邱吉爾反而用各種方法予以刺激。

事實是邱吉爾對華盛頓的態度，較之衞星國家的共產黨領袖所採取的態度，並沒有好或壞多少。衞星國家的共產黨領袖必須遵行克蘭姆林宮的政黨路線，初則遵令用雙腳站起，繼則遵囑用兩手倒立。邱吉爾也照着做了。初則說「監視德國」，繼則主張「重建其工業」。昨天他稱史達林爲紳士，今天却稱他爲成吉斯汗。共產黨徒說，「我的克蘭姆林宮，對的或錯的」；邱吉爾也以同樣的卑屈，「跟隨極端的華盛頓路線。」

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英國具有一種無比的力量，那就是與我們的歐洲鄰國不一樣，我們從未有左右之分，左派接受莫斯科的命令，右派卑鄙地反映美國的需要。就爲了有這一種分裂的存在，義大利與法國的民主政治，逐漸而着實地被碾成粉碎了。但是在英國，直到上星期六，我們曾成功地避免了這些命數的思想分裂。工黨與保守黨一直堅定地是英國的政黨，曾堅決拒絕墮落於美國自由企業或俄國共產主義的宣傳家之手。正由於英國人民的這個主要的一致，才允許我們完成了初期的和平社會革命，並致使我們對於國際關係運用一種和平的影響。假若邱吉爾的主張獲得貫徹，他將使保守黨變成了杜威共和黨（本文假定杜威獲選總統——譯者註）的一個英國夥伴，如同共產黨徒對於莫斯科一樣。

邱吉爾所提出的政策並非代表全美國的政策，而是反動的共和黨人的政策，那些共和黨人痛斥杜魯門與馬歇爾爲粉紅色的左派份子。馬歇爾一直想壓制反共的歐斯底里亞，並促使他最初宣示的歐洲復興計劃成爲一個可生活的西歐的和平復興計劃。現在，邱吉爾在支持杜威的演說裏，預期地痛斥它是無用的廢紙，僅次於對克蘭姆林宮無條件低頭的安排。

邱吉爾的與蘇聯和平相處的條件，如同卡薩布蘭卡會議所決定的無條件投降，是全面的，而因此是不可能實現的。他告訴克蘭姆林宮中的那些壞人離開歐洲，撤退到他們的一九三八的邊界。他們假使這麼做了，邱吉爾預料東歐的所有人民，將勝利地起來，去接受美國的生活方式。因此，很明顯地，這些條件的提出不是要作爲討論的基礎，乃是一種愛的美敦書，迫使蘇聯或則無條件投降，或則發動戰爭。

邱吉爾顯然相信他們可能接受這些「正當的要求」，因爲他們沒有其他抵禦美國原子彈的方法。假若他眞的相信這種荒謬想法，他應該徵詢專家的意見。沒有一個科學家，沒有一個負責的軍人，敢說原子彈或其他集中破壞的新式武器業已代替了舊的作戰方法，而使陸海軍力的使用成爲不必要。蘇聯，如同德國，一直不相信策略轟炸的政策，我們對於它在上次大戰中的效用嚴正地加以分析以後，當能證明在這一點上它們可能是對的。原子彈當然可以改變一切，但若因此假定蘇聯，即使它相信了此點，會屈服於愛的美敦書，那簡直是愚蠢了。我們必須認清的，「克蘭姆林宮中的那些壞人」如果面對了邱吉爾所建議的這種威脅，一定會比希特勒反抗得更兇，同時也會得到人民更頑強的支持。

那是很自然的，邱吉爾的演說，在美國的共和黨人看來，是一個最大的成功。它告訴美國，凡是美國最需要相信的一切，並揭露了凡是美國應該懂得的各種醜惡事實。但在別處的效果怎麼樣呢？假使我們告訴法國人，我們現在必須對蘇聯發出一個愛的美敦書，而其幾乎是必然的結果是法國爲紅軍所佔領以及殘酷的內戰，這會不會眞正地加強西歐聯盟的機會呢？斯干的那維亞，或比利時，或荷蘭，在聽到了唯獨大量的原子彈與無限制的軍備才能挽救民主政治的消息後，它們是否會歡躍呢？或者說得切身些，邱吉爾是否幻想英國的普通良好人民以滿腔興奮去聽他的演說呢？無疑地，也有人會這樣說，「如果它早晚會到來，讓我們來克服它吧。」但是極大多數，縱令他們相信邱吉爾，將以無可如何的情緒與投降主義來說這樣話的。

蘭杜諾的演說予工黨政府以難得的機會，駁斥邱吉爾把美國政黨政治伸引到外交的範圍內來。自從那盡人皆知的「Gestapo」廣播以後，艾德禮一直沒有這樣一個機會來叱責與打擊保守黨，並使那些相信和平得能保持以及英國未曾也不應變成美國的衞星國家的人們，都投向政府。

政府的回答是很明顯的。這是眞實的，假使發生戰爭，今天唯一足以對付蘇聯的防衞，是無限制地運用原子戰爭。這也是眞實的，西歐不能抵禦紅軍，波斯與伊拉克可能陷落，中國與東南亞僅有小規模的抵抗。但是這些正是所以要避免戰爭而不使戰爭必然發生的理由。像我們現在那樣地依賴於原子彈的事實，不是證明力量，而是證明極度的輕弱，而假使依照邱吉爾的要求，把英國的武裝部隊增加到一百五十萬人，其較弱更要增加。

因爲武力，儘管它最後能贏得戰爭，不足抵禦共產主義，今天的危機並不在紅軍突然要進攻——它爲甚麼非要這麼做不可呢？——乃在蘇聯不動一兵一卒，而西歐與東南亞都爲共產主義所赤化了。義大利的共產黨之所以成爲蘇聯以外最強大的共產黨，以及法國的工會之所以落在多雷士（Thorez）與杜克羅（Duclos）之手，其原因不在紅軍，而在社會的崩潰與經濟的危機。假使英國建立了到達一百五十萬人的武裝部隊，而破壞了所有填補缺口與復興經濟的機會，它將同時使目前僅擁有十萬黨員的英國共產黨一躍而爲類似法國或義大利共黨的大衆的政黨了。

所以這應該是艾德禮對邱吉爾的答復。我們認爲祇有社會建設而非原子彈才可以對付共產主義，我們又認爲我們的主要目標應該是建立一個共產主義侵入不了的西歐聯盟，因爲它的人民已經獲得一種共產主義不再有吸引力的生活程度了。關於這個目標，工黨統治下的英國業已給予一個能夠做到的現存例子。在英國祇有少數的共產黨人，因爲英國人民獲得了公平的機會。

其次，英國的政策並不是爲一個不可避免的戰爭作準備，或爲要求蘇聯無條件投降而使戰爭不可避免，乃是爭取時間來充實西歐的主要防禦——經濟與社會的防禦。今天任何人可能做的最壞的事就是「搶先一戰」際張一。我們所需亦是綜懈，使我們好適當地運用美援，應該在到了一九五二年的時候，我們可以脫離美國而在經濟上獨立。

我們必須在認識這個背景的條件下，來考慮防禦政策。它的目標不在贏得下一次戰爭——這是對於西歐的任何人一個沒有意義的句子——而在加強我們的外交，來達到爭取時間的目的。我們不能在任何情形下允許擴張軍備而致破壞社會建設，因爲擴張了軍備，在歐洲對共產主義的作戰也就失敗了。因此英國政府的主要目標必須是對於美國施以壓力。不得我們的同意，美國是不會發動一次戰爭的，他們有賴於我們對西歐與中東的防備。假使我們向他們保證，正像邱吉爾要我們做的，我們準備支持他們可能發出的愛的美敦書並仰賴原子力量來對付共產主義，則我們不但犧牲了我們自已的獨立，而且也犧牲了歐洲的將來。我們的任務適與此相反。我們的任務是告訴美國，在任何情形下，我們決不支持任何愛的美敦書；我們的任務是警告美國不要仰賴於原子彈；並且在細則方面，假使美國與蘇聯祇能在歇斯底里亞與猜忌的雲霧中看到它們自已的利益，我們的任務是在雙方都需要的現狀的基礎之上，促成「不同意的協定」。（觀察特約譯者譯）

徐淮戰局的變幻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從九日開始的徐東之戰到十九日形式上近似尾聲的宿（縣）蚌（埠）之戰，戰場的廣袤包括了徐州的邊沿和淮河北面，并將延及淮南。這一戰，確切地說，應呼做徐州淮海區之戰，或徐淮之戰。這一戰關係着京滬和江南的安危。而中國戰史上的傳統戰法又常是取江先取淮，因而徐州的得失，宿蚌的誰屬，正和淮河兩岸，江北江南的安危得失密切相聯。這確是最關緊要的一戰。

中央社連日公佈徐東碾莊八義集的「大捷」和共軍死傷近十萬，俘獲共軍，繳械無算。但至今我們還沒見到政府露佈俘獲共軍將校中上級指揮員的名單。十八日國防部發表的「徐州會戰總檢討」裏面，更有劉伯承陳賡兩部未被完全誘入國軍「口袋」陣地即告逃退的消息，并對劉陳退去，國軍「未能一顯身手」像似表示遺憾。又據中央社徐州十八日電，十七日晚共軍約十餘萬人向徐州東南二十五華里之潘塘鎮以入海戰術猛攻，與邱清泉兵團展開全綫血戰。按潘塘西北約十五華里處即爲國軍飛機場，共軍目標殆爲爭機場無疑。

關於這一戰局的雙方部屬，記者在本刊上期「大局的搶救」一文裏，曾略述其梗概，不再贅言。現在報導的是戰事進行中的變化因素和所謂國軍「大捷」，共軍「潰退」的眞相。以及國軍統帥部在這一戰中的戰術改變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因而造成共軍的「大量傷亡」。

孤注一擲與冒險試探

這一戰場上國軍的主要兵力有五個兵團。黃伯韜兵團在徐東，主要據點是徐州新安鎮一線間的碾莊、八義集和鄰近飛機場的潘塘。邱清泉兵團在徐西，主要據點是黃口和碭山。李彌兵團的大部預備隊控制在徐州城，一部在宿縣蚌埠間。孫元良兵團在永城蒙城間，主要據點是蒙城。黃維胡璉兵團在蒙城阜陽間，主要據點是阜陽。（按黃維爲這一兵團的司令官，他同時兼任正在籌設中的新制軍官學校校長，并不常在前線，而以副司令官兼十八軍長的胡璉代行司令官職權）。此外，徐州北邊的部隊是第三綏靖區司令官馮治安統轄的老西北軍，廿九軍爲其基幹。李部投共的張克俠何基灃，都是馮部的要員而且都是西北軍的舊日將官。蚌埠除李彌的一部分隊伍外便是第四綏靖區司令官劉汝明統領的舊西北軍的兩軍人。另一重要據點的淮陰是第一綏靖區司令官周碞所屬的部隊和民團。共軍方面是：陳毅的主力對黃兵團；陳賡的主力對邱兵團；劉伯承的主力是穿越永城蒙城一綫，一方面對付孫胡兩兵團，一方面逼近了徐南的鐵路綫的三堡，想接應陳毅，吃掉黃兵團，進逼徐蚌後的前進部隊，以便牽制徐蚌，圍住宿縣，孤立淮陰，回頭相機吃掉其他的兵團。十一日到十三，黃兵團處境最危險。據悉，那幾天內，黃有兩個師已被吃完，新接任不久代林彪出任六十三軍軍長的陳章的失蹤（一說已自殺）就是在這個時間。十二傍晚，共軍且已逼近徐州東南的潘塘鎮，威脅了飛機場。同時，十日到十四五日幾天間，南京的情形也異常混亂，搬家的如潮湧一般，顯然與這一段戰事的緊急有關。就在這緊要關頭，聽說最高當局在某一高級幹部的聚會上表示了他的必死的決心。而且當衆立下了誓言：要大家信任他，他在軍事上絕對地有把握，而且會有妙計可以使徐東戰局立即改觀。果然，他立即把可以調動的部隊，除了屬於桂系的駐漢湖一帶的兵力未調遣外，一切可用的都集中在津浦南段，而且增援了徐州外圍各綫。此外，則將所有各地的空軍一概調來徐州方面，平均每天每次四百架的輕重轟炸機不分晝夜的飛上前綫，更要緊的是開始用了大批的特種炸彈，其殺傷力確是驚人，結果是凡經此項炸彈轟炸過的地方是周圍八里內幾乎一概被燒完。十二日的中央日報號外和翌日的報端載爲「殲敵三萬七千」以及後此的消息：徐州會戰十日，殲敵逾十萬等等；據軍事觀察家的一種推斷，殆即指這種特種砲彈的結果。近日自徐州逃來的難胞也輾轉相語地說飛機上曾擲下來不少的奇怪炸彈，炸死燒傷的軍民無算，而且負傷的傷勢也很慘。同時，高級軍事機關透露的消息也坦承認有這種炸彈。共軍對此新武器的出現當然是猝不及防，只有知難而退了。國軍配合着這一形勢的突變，大概才有所謂邱李兩兵團對陳毅施行反包圍以救黃兵團。共軍作戰一向的作風是敢於冒險，作試探，但也能迅速轉退，巧於避戰。所謂劉伯承的三堡司令部被攻入和劉「僅以身免」，大概就是爲了要暫避此蒞懸之戰，並求全師而還。

這次徐州會戰，就軍略上說，國軍是「內綫作戰」而共軍是「外綫作戰」。外綫作戰的正確戰法是要能「分進合擊」，更要能收能放，進退上，隨機應變，不使其主力遭遇對方的圍殲。外綫作戰應當掌握着「利害轉換綫」。這是戰略戰術上不移的原則。這次會戰，照政府公佈的消息看，共軍兵力約爲四五十萬，國軍正是旗鼓相當，事實上或已超越了共軍方面。但戰果是「消滅共軍十餘萬」，劉伯承陳賡兩部又未能「誘入口袋陣地」，致國軍「未能一顯身手」，可見共軍是分進未利，合擊未成，而趕快地收了兵，隨機應變，退師迅還。這顯然是國軍的一步「少算」。同時，國軍方面，當黃兵團被陳毅圍得緊急時，李彌兵團雖然一時站穩了脚，邱兵團并能由徐西繞過徐北鐵道綫，一方面震住了馮治安部隊的張克俠何基灃所影響的兵變，一方面又能對陳毅作了個半包圍圈，因而解救了黃伯韜的險關。然而結果仍是沒能夠將陳劉兩部予以圍殲。孫胡李三兵團也沒能夠將劉伯承的主力打完，終於讓他們「逃退」了。單就這一點說，國軍實未能依照內綫作戰的戰法，以運用利害轉換綫。按理，邱李兩兵團既爲國軍的勁旅，就該瞥識當時徐東、徐西、徐南的輕重利害，而當機立斷，決定轉換利害綫，大胆的轉進，一方面集中力量將陳毅或其他的主力予以殲滅完，倘是這樣，則所謂「徐州大捷」才能算是名實相符。

戰局現勢與今後發展

今日中國內戰的局勢，全面與局部本是不容分割孤立開來看。華北與華中，陝東與華中部是息息相關。而徐淮戰區，雖偏居華東，實與華中密邇連貫。當徐淮戰事進行中間，冀東之戰適又配合着晉綏之戰揭幕。陝東之戰恰也在徐淮間歇時展開。共軍的這一策動，計劃上，當然是有他整個的打算。這一計劃，恐怕不僅是爲了完成整個華北與東北打成一片，而且也可能正是針對着徐淮戰局的變幻，繼續企圖着對付徐州方面的最大的第一綫兵團。我們就題論事，現在只分析當前徐淮戰局的形勢，并判斷其以後的發展。目前國軍在這一方面，不僅是處於內綫作戰，而且還是一種防禦戰。由於新兵源，即第二綫兵團還沒能夠完全裝備起或訓練好，或者因爲三南大據點的防守戍邊而一時不容完全拿出來放在徐淮方面，因而在基本上，目前徐淮戰區的兵團是沒有充分的後備

兵團。衆所周知，當杜聿明從遼西轉進營口撤退而來的有生力量還沒到達後方的江南時，京滬正是空虛得可慮。現在雖然有了幾師青年軍和交警，憲兵團放在京滬線，然在當局的考慮裏，恐怕這還差得很遠。所以說當前的徐淮戰局，國軍在戰略上是一種單純的防禦戰或者說是一種消極性的防禦戰。積極性的防禦應該是一種攻勢的防禦，那就是說，目前防禦得住共軍或打了勝仗，還不能認爲這已經防禦穩了徐海區和淮北淮南，更不容認爲京滬已是磐石之安。唯有單純的防禦持續一時之後，即可增援新兵團而轉消極爲積極，轉守勢爲攻勢，進而將共軍擊退在預定目的地以外去，且能收復預定必須收復的那些已失的重要的市鎮或省會和據點，然而，這在日前是難以做到這一步的。於此，我們已不難明瞭爲什麼在所謂「徐州大捷」之後，美國乃至英國和坎拿大仍在大規模的撤僑。可見「友邦」對徐淮戰局的軍事觀察，仍是不敢完全放心和樂觀。另一題外也算題內的消息，値得在此附帶地一提。對當前的徐淮戰局乃至北方緊張的軍事形勢，聽說美國方面曾向當局作「調用日本兵來應急」的建議，最後經過當局的縝密考慮，認爲這計劃在目前還使不得。但另一方面，在中國發足了財的飛虎將陳納德却於此時敢作大胆的狂妄的請纓之舉，他認爲一經中美當局雙方同意，即有「事實上一切所需的轟炸機，戰鬥機，運輸機，均可能自中國境內取得」。他并表示他的自信說：「我可確定，如我現在已有此項空軍，則太原之圍可於三日內解除，使共軍退入深山窮谷，我深信飛虎隊參戰後，將立即達成軍事的均勢，而有利於中國政府的剿共軍事。」半官方消息傳出，當局對這個傢伙的建白，確在考慮。但此間權威觀察的揣測是：陳納德所開的這張保險單，大概也是要用那不怕死的美國傻小子硬着心腸來投射那日前在徐東戰場上所用的一類的炸彈來毀滅中國人的。萬一不幸，這一個殺中國人結束中國內戰的妙法成爲事實，恐怕結果將適得其反，不僅不能使共軍就範，且將引起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的正義人士的強烈的反感，而採取一種不利於美國和親美政府的行動的。

　　當前的徐淮戰局形勢，就國軍方面看，一方面是爲環境所囿，爲實力所限，不得不仍採取着單純的防禦戰，一方面，則翹盼着各式各樣的「外援」和「外力」的奇蹟。陳納德的參戰是一例，而南京大員們熱戀地周旋「海外小救星」蒲立德亦是一例。可是還是不可靠的。用奇兵，唱空城計，只能是一種偏鋒之筆式的軍略，不得已時的一種計算，在軍事原理上算是冒險，不足爲訓的。共軍方面呢，他們的退却，據悉，大概最多是退出了徐州外圍的幾十華里，且正在加緊補充，作一個大喘息。等到晉綏、冀東、陝東、各方的局勢變化得於他有利時，就很可能再發動一次二次的攻勢。因爲他們的兵源補充易，而目前又是居於一種攻勢的防禦，積極性的防禦戰線。一旦新生力量整補齊後，即可發動一種配合全局的攻勢。而且從這次戰役裏他們也曾體驗到國軍的傳統戰法是有了相當的修正或改變。那就是不再堅守大據點，寧肯縮短戰線和縮小戰圍，儘能保存相當的有生兵力以備他日的萬一，從而，他會在另一地帶一面採取攻勢的防禦，一方仍是對國軍合圍而進擊。這一形勢的到來，不會等待很久的時間的。因爲目前國軍的第二線兵團還沒裝備齊，更多的「美援」軍火飛機還是可望而不可即。今天已是共軍秋季攻勢結束以後，冬季攻勢的開始，如果說他在這次徐淮會戰裏有了損失；但同時他在應付這新裝備的國軍，和使用新型炸彈新武器的國軍上，必已帶回血的新的教訓去，而且他決不會輕視這一教訓的。

陳布雷之死與翁文灝之拖

　　「徐東大捷」聲中，有二事値得一提！一爲陳布雷之死；一爲翁內閣之不生不死。陳之死，是「激烈輕生」感傷時勢而自殺的。陳氏爲人如何，政見如何，無須提，但以他那「反共」的典型，書生本色的大吏，於效忠他的領袖廿年之餘，竟忍服安眠藥百粒以死，是頗耐死硬派而至今還未死的一般人物深思的。據聞近半年來陳氏感受的刺激特多，他的女兒陳璉因被牽連在北平那一樁軍事間諜案子裏被逮下獄，因而影響了他的倫理上的情緒，和「效忠」的信心，說來是近乎事實的。近因大概是他到處聽到民間困限價和金券等等激起了普遍的搶米的種種不利當局的消息，更有關係。和戰紛嗽無是處，邊城瀰望亡萬里，「三十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的觸景傷情以致於厭世，也是有的。他死的半月前，外面就有一種傳說，他半月以來提筆竟不能寫出一字半句，試思以「長蟲筆樣」「立馬萬言，一揮而就」聞於國民黨的陳布雷，何以不能承命起草重要文告了呢？這也是樁很有意味的事，而遺書數緘，竟無留致CC昆仲的一紙半柬，還和傳說他十二日之夕，當局命他起草某項文告，他囑附僕人回話說他已睡下了，實則決死之念即定於此時，將各種事體聯繫起來一尋思，不難想像當時在陳布雷的腦際，時勢已經杌隉到如何的田地了。

　　翁文灝之預備摜紗帽，和他早應該掛冠而去，巳是政局常識意中的事。但他經過當局「你再幹三天」「你再幹一星期」的挽留，他竟也能夠一再的遵命辦理，這也眞是中外政史中鮮有的例外之例。據確息：陳立夫對組閣是頗感興趣的。他剛由美歸國時，對立委們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請席，正是爲了杜威當選後，自已可以「脫穎而出」。不久前，他所領導的一部份立委們，對翁攻擊得不遺餘力，也正是爲了組閣的事。但自從將總統半公開的表示仍屬意於張羣後，陳的攻勢才略見稍緩。至於宋子文，吳鐵城等打算，也均巳成過去。現在聽說張羣爲了組閣前的各種準備，有飛美國之意，大概此君幾時準備就緒，翁文灝也就可以走路了。

十一月廿日寄

（上接第十二面）

者態度傲慢，嚴然以上帝自居。其實，錢氏的野心是決不止於做做「上帝之夢」的，他還想更上一層地去做上帝的改革者。李長吉詩云：「筆補造化天無功。」錢先生的眞正野心是想拿藝術去對抗自然，把上帝創造天地時的疏忽給彌補起來。「圍城」一書，除了臭人醜事外，還特地挑出宇宙閒最惹厭的一些東西，如斯醫、狐臭、跳蟲、飢餓、夢魘、竊子、喉核、廁所之類，來加工描寫。揣作者的用意，無非想化臭腐爲神奇，拿糞窖中的材料來營造八寶樓台。平心而論，這書在題材、意識諧方面，可攻之點自然不少，但作者感覺的纖敏和筆觸的精妙，却是無論如何難以否認的。書中第五章記方鴻漸旅行所見，那些情景，抗戰期中曾在內地奔波的，誰沒有經歷過？可是當代小說家中，除錢氏外，還有誰能寫出這樣辭采絢爛的一筆？批評「圍城」的人，如果連這一點也把它抹殺掉，那不是眼光出了毛病，也必定是把心眼偏到夾肢窩裏去了。這一點點的公道，我們覺得必須替作者維持的。

　　關於寫作的方法，菲爾丁和錢鍾書慣用的都是詩人的技巧。佛斯德（E. M. Forster）說過：小說是介乎詩與歷史間的一種東西。也許是有感於自已題材的過於醜惡，這兩位小說家都拼命用「詩」來補救。菲爾丁在「湯姆．瓊斯傳」的第四卷第一章裏擬自白過：「因此，爲了使我們的作品不至於被比作這些歷史家的出產品，我們便儘量利用機會，把各種的明比、描寫文、以及其他詩的文章，散入全書。」這一段話毫無折扣地被錢先生拿來實行。「圍城」裏面的描寫文最多，寫景的就有十段左右。這些雖都只短短的，却都極富詩意，而且也還均勻地散佈書中。讓我們舉出一段來看：

　　「天着早起了黑霎，漏出疏疏幾顆星，風浪像譯發在吃的聲音，白天的汪洋大海，這時候全部化在更廣大的昏夜裏。襯了這背景，一個人身心的擾動也縮小以至於無，只心裏一點明天的希望；還未落入睡鄉，在廣漠澎湃的黑暗深處，一點螢火似的自照着。」（十九——二十頁）

這是緊接着方鴻漸和鮑小姐在船上調情之後而來的一段描寫，惡俗的場面後偏有此清幽的景色，可見作者是有心要借雲水清光來給我們洗眼的了。風景以外的零碎描寫，書中更到處可見，美不勝收，例如：

「鴻漸昨晚沒睡好，今天又累了，鄰室雖然絃歌交作，睡眼漆黑一團，當頭罩下來，他一覺睡到天明，覺得身體更縐屑蜷伏的疲倦，都給睡眠熨平了，像衣服上的縐紋摺痕經過熨鐵一樣。」（一九八頁）

徐蚌會戰的分析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徐蚌會戰，可以看做共軍冬季攻勢的開始。徐蚌是京滬的屏障，南京政府之安危所繫。雙方使用的兵力空前龐大，據估計各在五十萬人左右，這一仗在全局上的重要，將等於錦州會戰對東北的影響，所以中外注目，都以緊張的心情，凝視這個戰局的發展。

上海某報社評，認為國軍對這次大戰的部署又犯了區域防守，備多力分的大忌，而且重點在西，忽略了津浦路東側的淮海地區。這種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其實國軍這次的部署，兵力已經相當集中了，西撤鄭汴，東撤海州新浦，都是為了厚集兵力。徐州一隅之地，早就已是「兵山」，兵力如果再過分堆砌，緊急時是否運轉得開，大成問題。要鞏固江防，必須東守淮水西守漢水，是地理上必然的形勢，從襄樊南陽經信陽到大別山以至淮海的一字長蛇大陣必得如此擺開，至於縱深與重點於列陣之時，負責指揮者當然也有其必要設施，即使不知兵者，恐怕也不會擺出一個完全裸露的長蛇陣來。至於忽略津浦東側蘇北淮海地區的防禦，恐怕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第一我們知道蘇北廣大地區還是在共軍手中。而且連雲港以南迄吳淞口的海岸完全是沙岸，沒有一個可以利用的港口。所謂「抗日靠山，剿匪傍海」，並不是指沒有港灣的沙岸的海，這種瀕海不但不可以做為依托，在某種不利的情勢下反倒成了背水陣。其次這次華東剿總劉歸華中剿總指揮，一方面是以白崇禧之足智多謀補劉峙之將才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在必要時，教白崇禧拿出龍潭戰役時的精神來支撐徐蚌，穩定南京。因此不得不在鐵路以西厚集兵力，與華中互為犄角。

說實話，國軍在多次失利中，不只是戰略上有錯誤，更重要的有些「人」的問題，部隊間的矛盾不能解除，命令也時常不能貫徹。濟南之陷，吳化文變起倉猝；錦州之失，衛立煌貽誤戎機。這次徐蚌部署，使當局最感不安的還是「人」的問題。西北軍久失領導中心，在抗戰期間，一部分始終立於抗戰陣營之內，一部分則投降敵偽，在偽軍中除了江南的任援道，武漢的葉蓬，及華北的齊燮元外，大部分都是西北軍。勝利後他們又都成了自新軍，這批自新軍也被投入內戰場中，抗戰的與附逆的西北軍的弟兄們又重相會。目前大部分集中在蘇魯豫皖邊境，自淮海地區以迄南京，這是西北軍從民國十九年來，首次得以駐在同一地區。在政府軍系下的西北軍，除黃樵松遠戍太原外，大部分駐在同一地區，屈指可以數出的有劉汝明、曹福林、馮治安、李文田、孫良誠、畢書文，還有衛戍南京的孫連仲，他們可以說是一氣相通。共軍方面一定在設法利用這些矛盾，從「人」的方面打主意。西北軍到中共陣營去的人已經不少，先後有高樹勛、趙壽山、孔從周、吳化文等。所以徐州會戰之初，又有何基灃張克俠的率部出走，徐州東線的危機由此而起。馮治安來京後住曹浩森家中，仍未返防，孫連仲已經調為總統府參軍長。政府方面消息，謂何張帶走九個團，現在已經跑回七個團來，詳情如何難得而知。

我們知道七七軍與五九軍為盧溝橋抗戰時二十九軍的主力，當時的二十九軍，名義上是一個軍，而其實力在十萬人以上，所以抗戰開始，為了紀念「七七」，將他們擴編為三個步兵軍，一個騎兵軍，騎兵軍是鄭大璋，步軍有明「七七」與暗「七七」，都含有紀念「七七」的光榮，他們是承受如此的新番號：馮治安七十七軍，張自忠五十九軍，劉汝明六十八軍，（五九與六八都是相合十四，二分為七七），以前的四個軍現在只剩了調到蚌埠一帶的劉汝珍率領的六十八軍了，十萬健兒經十年滄桑，落得如此，宋明軒（哲元）有靈，當不勝慨嘆！

共軍以四五十萬的兵力，捨延翼、滲透、鑽隙的老本領而堅攻徐州，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知道華東共軍，雖經昌濰、兗州、濟南三次大捷，但其正規作戰的能力還不如東北共軍。所以一般人開始估計，共軍很可能從兩翼向南滲透，將堅城徐州丟在後面，吃掉衛星據點，使徐州完全陷於孤立，而急劇南下，重握蘇北與兩淮，威脅京滬。可是從事實上，這次的徐州之戰確是一場主力會戰，雙方折損均極慘重。共軍為什麼會有這種的衝動呢？大概不外三個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在秋季攻勢中，共軍極為得手，山東及東北的成就，超出了一般人的逆料，這種銳氣給斷可乘，不宜停頓，再給國軍以喘息和部署的機會；第二京滬經濟狀況紊亂，人心浮動，外力再加，適足以促進其內裏的亂力；第三何基灃張克俠的倒戈，使徐東暴露，背側陷孤危，足以影響這一個地區的西北軍和所有國軍的士氣。

基於以上三種原因，形成了共軍主攻徐州的行動。另一方面共軍即使堅攻徐州不下，甚至大量折損有生力量，國軍一時也沒有再入山東的可能，即使山東兵力感覺不足，山東遼東一水之隔，海上增援亦非難事。在可能有「勝」不會有「敗」的基礎上，也是他致以數十萬兵力向徐蚌戰場上投擲的原因。在國軍這一方面，守徐州就「只准成功，不准失敗」。徐蚌果眞有失，那就是邱清泉、李彌、胡璉等主力兵團都被打垮，這幾個主力兵團如果最近失去了戰鬥能力，不僅大江以北盡入共軍掌握，即使再欲確保江南，時間上及民心士氣上已不許可。所以徐蚌會戰在政府是生死存亡之戰，在共軍是挾銳摧堅企圖得一大選的玩法。兩方心情的輕重迴然不同。

官方人士旬前評論徐州會戰形勢，認為國軍已獲初步勝利，徐州會戰將有豫東會戰重演的可能。不過我們知道豫東黃泛區會戰，國軍並未獲得決定性的勝利，而是共軍見好收場，吃掉區壽年兵團後脫離戰鬥，雙方死傷是差不很多的，可以算做一幕沒有終場的武劇。這次徐州會戰，東線黃邱兩兵團攜手，官方宣稱先後殺傷共軍近十萬人，但是國軍曹福林部在商邱的折損，黃伯韜在東線及孫元良在南線的傷亡，邱清泉在徐西黃口及徐東八義集的衝殺，其死傷數目當亦相當可觀。另外還有何基灃張克俠帶走的部隊，一減一增出入也算不小。

以上兩個例子裏的最後一句話都是所謂「明比」(Simile)。讀「圍城」的人首先注意到的，必是書中這種比喻之多與新奇。但是這些跟「湯姆瓊斯傳」裏的比喻一樣，都是直接從荷馬學來的。「伊利亞特」中的一百八十個明比是它們的藍本。這種比喻的特點是能獨立自存，有時甚至喧賓奪主，把所比的丟在讀者腦後，叫他只注意比喻本身。「圍城」中頂標準的荷馬式明比，該是下列這接連在一起的兩個：

「鴻漸嘴裏機械地說着，心理彷彿黑牢裏的禁錮者摸索着一根火柴，剛劃亮，火柴就熄了，眼前沒看清的一片又滑回黑暗裏。譬如黑夜裏兩條船相起擦過，一個在這條船上，瞥見對面船艙的燈光裏正是自己夢寐不忘的臉，沒來得及叫喚，彼此早距離遠了。」（一九一頁）

明比和描寫文構成了這兩部作品（尤其是「湯姆・瓊斯傳」）的大部分的血肉和生命，假使把這些通通刪掉，這兩部書縱不至生機枯萎，剩下的精華怕也有限了。

以上是就二書相同之點來作比較。假如還要更進一步地去討論它們的互異之點，那我們可以簡單地說：「湯姆・瓊斯傳」中的事實多於議論；「圍城」則適相反，議論多於事實。這分別是植根於兩位作家生活經驗廣狹的不同。菲爾丁的經驗比較豐富，所以他的作品雖也一樣的以「批評人生」為主要目的，却多少總帶點「表現人生」的傾向，儘量把來自多方面的事實填塞進去。錢先生所見的人生似乎不多，於是他更珍惜這僅有的一點點經驗，要把它蒸熟、煮爛，用討人的神經來感覺它，用哲學家的頭腦來思索它。其結果，事實不能僅僅是事實，而必須醞上一連串的議論。這議論由三方面表達出來：作者的解釋、人物的對話、主人翁的自我分析。說到這裏，不由的令人想出一個新的名詞：「學人之小說」。

爐邊天下

美國在華還能做些什麼

費孝通

「我也許會丟掉飯碗，但是美國民意測驗者應該自殺。」——這是一位專程去美採訪大選新聞的法國記者上了「杜威勝利」的大當之後的氣憤話。在許多人看來，這次美國大選眞是個大玩笑。會丟飯碗的不祇是那位法國記者；你想，以未來大使自居的蒲立德先生，過河焚舟地在大選前夕脫離了民主黨，興冲冲預備來東亞搞個大買賣，誰知會落得這個下場？當他再見他的莫逆知己們時，怎樣開口才是？心裏的酸痛，祇有他自己知道了。這玩笑也開得夠了，比了原子筆大王更「超級」，美國眞是個「競爭」世界，連撒謊也會有這一手。

這個大玩笑連累的人可眞不少，最主的也許是美國的政客們自己。聽說在華的有些大員，已經打箱卷被蓋的，一聽說杜魯門聯任，平地直跳起來，打開箱子，找酒瓶，一醉兩天。於是美國政策將大變的說法也滿天飛了。其實，這幾個星期，喜出望外的政客們也許還在乾杯豪飲，朦朧未醒，政治中現出一段眞空。天下大事，醒來再說。

杜威一陣空高興之後，上海濱去曬太陽了。但是有些人却忙起來了。國防部長福萊斯特行程匆促，像蜻蜓點水般巴黎、倫敦、柏林的作「效率」飛問。那些被傳為將在明年正月辭職的大臣們交頭接耳，把重要會議移出了國都華府。為的是什麼？誰也不難猜想。大老闆們會在選舉票前低頭，才怪哩！維辛斯基急着喊「謹防珍珠港事件」，不是無因的。

把杜魯門重選看作美國大變又難免上當。美國老百姓在「美式民主」裏也怪可憐的，投票完畢，他們又得乾等二年才能再表示意見了。其間嘰嘰不休的又將是那些「該自殺」的御用喉舌。華爾街金元的魔力並沒有因大選而減弱。我們要「預測」美國政治動向，還得在金元光彩裏去窺視。杜魯門的聯任也許就等於過去政策的聯蟬，表面上要變一些花樣，應付一下這些非「民意測驗」所能反映的民意。

這樣說，不是許多對杜威落選而失望的人還能重溫好夢麼？我並無此意。美國外交政策是否會曲折修改是要看美國之外的世界是否有重大改變。我想，我們如果假定美國外交上主觀的希望並沒有改變，大概不致大錯的。主觀希望是在這世界上獨霸，造成個「美國世紀」。在這世界上，花旗商品可以通行無阻，各地原料都可以用美金收買，經濟血脈條條通向紐約心臟。美國工人有工做，老闆們有錢掙，沒有搗亂份子和他們為難。富翁們對這兩洋外的窮人表示着憐憫，於是有各種基金，用了大批「社會工作者」，經營世界性的救濟事業。他們良心上因之得到安慰，不但今生可以享受，死後還可以進天堂，上帝不會拒絕慈善家的。

順我者可以被救濟，逆我者將遭受超級空中堡壘投下原子彈的災難，一個人間的上帝。——這是大體上不變的主觀希望。但是客觀上却並不是個如意算盤，於是在步驟上總得隨時做些適應。適應的步驟得依客觀局面的變化而定。如果我們要不致太上當，還得放開美國外交的主觀因素，多看看客觀事實。

關心美國對華政策的人在這個時候似乎在盼望一個重要的轉變。這轉變是可能的，但是原因不是在那個姓杜的上了台，而是東亞客觀的局面在過去一個月裏的確發生了重大變化。這變化是美國在中國所扶植的對象，在軍事、經濟、政治各方面都已日見式微。這式微的過程却並不因美援而有所改變。而且這過程又正在加速進行，如果再維持原來政策，勢將在東亞大陸上看到一個壯大的反美政權。所以這個時候美國又需要謀新的適應了。

美國將怎樣適應這遠東的新局面呢？他們的政策將倚於他們對以往政策的看法，換一句話說，他們一定要問為什麼以往的援華沒有發生所希望的效果？回答可以有好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認為援助的數量不足，如果經濟和軍事上能充分支持南京政府，這個危機還能挽回。第二個層次認為不是數量問題，而是使用美援的機構不健全，經濟援助落入了官僚的荷包，軍事援助甚至轉運到了敵人手裏，所以如果要繼續援助必須加緊監督，甚至挑選美國能信任的人出來負責。第三個層次更深了一層，覺得行政的腐化和政治有關，現在執政的集團已經沒有希望，所以如果要防共就得另找援助對象。凡是有能力有成績的才值得扶植。問題是怎樣托梁換柱，另起爐竈。第四個層次則懷疑在中國反共是否必要。美國所怕的不是中共，而是被認為在中共背後牽線的蘇聯。美國在遠東所需的軍事防線，有沿大陸的島嶼在握，已夠維持；在大陸上祇要有個安定的市場就得，在中共支配下的大陸，如果要建設，還可以是一個美國的市場。在這層次裏美國可能停止過去的援助，貫徹袖手政策，等國共打出個結果來再說。第五個層次，也是最後的層次，就是根本認為反蘇是無利於美國的，為世界和平，美國和蘇聯應當停止冷戰，重行合作建設這世界。

美國現在離開第五個層次可能還遠，但是第一個層次似乎也已經過去，甚至也已經走出第二個層次了。蒲立德上次來華已主張嚴格監督，可以說走進了第二個層次，但是事實上似乎並沒有走通。現在連這個辦法實現的可能性也不太多了。最近美援直接運來華北表示已入第三個層次。但是這個扶植地方勢力來對付具有整體性的中共，其成功的機會也屬渺小。

美國政府面對這連中國最高當局都認為可能的「不幸」局面，就是中共控制大陸的可能性，不能不在第三和第四的層次裏徘徊了。留在第三個層次裏罷，如果地方勢力擋不住中共壓力又怎麼辦？出兵既不可能，撤手又難出口。進入第四個層次罷，中共和蘇聯的關係又拿不穩；中共為了建設不會拒絕沒有政治條件的投資，但是所投的資本又有什麼保障？單做買賣罷，中國經此兵戎，元氣大喪，要自力更生，還得有相當時間才能消納美國商品。把中國扶植起來了之後，如果美蘇終不免一戰，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國保不住不幫蘇聯一把，在東亞多了一個巨敵。——杜魯門政府决不致在中共控制大陸之前走入第四層次的，到了不得不向這層次走時，也許又太遲了。

美國對華政策已經處於被動地位。既沒有採取第一層次的能力，又沒有採取第四層次的決心。結果大概還是留在第三層次中眼看自己主觀希望的幻滅。

南京的立場是很明白的，最後一個希望寄託在華盛頓，敲、求、嚇、詐，一切手段都會用出來。顧大使在杜魯門當選後要求美國趕緊宣布對華政策是情急之詞，而華盛頓的反應却既遲又淡漠，杜魯門剛剛喜出望外，在奇蹟前還沒有摸清楚選民為什麼又選他的理由前，不敢把共和黨的調子在這個時候彈唱起來的。馬歇爾則忙着處理歐洲問題，而且自己是否辭職還沒有定見，這會使他煩惱的中國問題決不會引得起他的興趣。——急病遇着慢郎中，有什麼辦法呢？我深怕這位慢郎中到達時，除了第四層次可走外，已別無他途了。

十一月十六日

書評

「圍城」與"Tom Jones"

林海

錢鍾書先生的「圍城」，單行問世以來，給我們寂寞的文苑添了不少的聲色。它在過去一年裏面所受的「讚賞」和「讚美」，如果全體搜羅起來，大約總可編成一巨冊的。但是評論這書的人雖多，却還未見有誰指出它的淵源。有些批評家看見書中夾着許多中西典故，不禁怒髮衝冠，大罵作者自作聰明，把小說當作駢體文來做。那曉得這種在稗官野史裏引經據典的作風，別處老早就有，並不是錢鍾書發明的。這只是舉一個例來說罷了，其他有來歷的新奇手法，書中還有的是。我相信作者寫這部小說的主要動機，便在介紹這些外來的手法和作風，「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云云，恐怕還只是次要的。因此，我想破些功夫，來給讀者指點這書的來源。不過，這工作很不容易。錢先生是以博極羣書著名的，他這部作品所取法的西洋小說眞不知有幾派幾家，書中甚至連有些比喻都有出處！詳細的註釋應該留給未來天下太平時的學者去做。這兒只打算挑出一部性質跟它最近似的小說來比較，這就是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家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的傑作「湯姆·瓊斯傳」（Tom Jones）。

錢鍾書和菲爾丁至少有兩點相同：第一，他們都是天生的諷刺家或幽默家，揭發虛偽和嘲笑愚昧是他們最擅長同時也最願意幹的事情；第二，他們都不是妙手空空的作家，肚子裏有的是書卷，同時又都不贊成「別材非學」的主張，所以連做小說也還要掉些書袋。這兩點，前者決定內容，後者決定外表，他們作品的「質」與「形」可由此推知了。我不敢說錢鍾書的「圍城」有意摹仿菲爾丁的「湯姆·瓊斯傳」，但我敢斷言他在懸擬這本書該怎樣寫時，腦海中必然有這一部小說的影子在那裏浮動着。不信，且來看這兩部小說的各方面。

菲爾丁在「湯姆·瓊斯傳」的開卷第一章裏，以飲食爲喻，聲明他要奉獻給讀者的佳餚只有一道——人性。說得明白一點，他在那本小說裏惟一要做的，是忠實地刻畫人性。錢先生，雖不曾公然拈出揭發人性的宗旨，但他的「圍城」却更徹底地是一部人性大觀。這二位心目中的人性，讀者可以想見，是決不會高明的。「湯姆·瓊斯傳」中的人物，除一兩尊外，可大別爲二類：下流的和陰險的。錢先生比菲爾丁還要憤世嫉俗，他在「圍城」的序文中劈頭便表白：「在這本書裏，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還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這就是說，他不承認世間會有 Allworthy（見「湯姆·瓊斯傳」）那樣一塵不染的完人。我們的世界，照錢先生的看法，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而是糞窖——這裏面熙熙攘攘着的儘是些臭人和醜事！一部「圍城」，便是專門預備給糞窖中的人物畫臉譜的。臉譜有三副，用韓非子的字眼來形容：一副代表「愚」，一副代表「誣」，還有一副則是兩美並全「愚而誣」。恰似但丁對待「地獄」中鬼魂的態度，「圍城」的作者對於糞窖中的三類人物還要加以區別。他比較最能同情的是第一類的「愚」。這類人物的毛病祇在抵擋不住肉體的引誘，正合老子所說的「吾所以有大患者，惟吾有身」，準情酌理，是可以原諒的；書中的方鴻漸和趙辛楣屬於這一類。第二類的「誣」病在心術，在「地獄」中應屈居下層，自然更要厚加訶斥；書中的韓學愈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三類的「愚而兼誣」，那是窮兇極惡，不可救藥，只好用大棒子來痛打了；書中的李梅亭屬於這一類。「圍城」中所有人物不出這三類，中間只有一個例外——唐曉芙。作者對於唐小姐特表好感，似乎有心發慈悲，給糞窖安上一朵花，藉以略解穢氣。但卽便是唐曉芙，好處也只是不愚不誣而已，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超人德性，別說比得上 Allworthy，連 Sophia（亦見「湯姆·瓊斯傳」）的程度還差得很遠呢。

正由於宗旨相同，這兩書的「口氣」（Tone）便也不謀而合。菲爾丁在「湯姆·瓊斯傳」的第八卷第一章裏曾向文藝女神呼籲，希望能讓自己追蹤亞理斯多芬、劉仙（Lucian）、塞萬提茲、拉柏雷、莫利哀、莎士比亞、斯威夫特、馬利服（Marivaux）諸人，以幽默來充實本書的篇幅，「直到人類培養了只對別人的喪廉忘恥之行發笑的好脾氣，以及深以自己的同樣行爲爲懨的謙遜美德。」錢先生並沒有向誰呼籲，不過我們可斷定，他心裏所懸慕的前代作家，必然的也就是前面那幾位。「圍城」和「湯姆·瓊斯傳」同樣的是以幽默諷刺的筆調來寫的，這筆調浸透全書，成了一種不可須臾離的原質；偶然一離，讀者立刻便有異樣之感。而也就在這裏，這兩位作家稍微有些不同。菲爾丁雖好諷刺，却並不悲觀。他不害斁板起臉孔來教訓，但有時也說正經話。因此，每逢他轉換口氣，總是從「幽默」改爲「正經」。錢先生則是個徹底的悲觀家，「諷刺」之外，惟有「感傷」。這情形從兩書的結局處看得最清楚。菲爾丁在他大作的第十八卷第一章裏，便會公開表示要改變作風。果然，在這一卷裏，作者笑意全收，以異常嚴正的態度，讓奸邪敗露，佳耦成雙。諷刺了一場之後，到底還是止於至善，眞正的十足迭更斯作風！「圍城」的前七章筆飛墨舞，極盡冷嘲熱諷的能事，字裏行間看得見作者臉上嘻笑的表情。從第八章起，這笑容漸漸消去，跟着來的不是「正經」，而是「悲哀」。第九章幾乎全浸在悲哀的情調中，縱有笑聲，也是非常勉強的。雖然這兒述的仍是方鴻漸的事，作者的心聲無形中已從裏面透露出來了。本來書名「圍城」，是也應該有此收場的。圍城不僅象徵着方鴻漸的人生觀，實際也代表着作者自己的。

以體裁來說，這兩部作品都是所謂惡漢體的小說（The picaresque novel）。這派小說有個特點，便是不大注重故事，因而也無所謂結構。作者照例是利用主人翁作線索，來貫串全書。這主人翁又照例是天生一副驛馬命，永遠不會安逸。作者便借着他到處漂泊的機會，來刻畫社會各階層的形形色色。在這一點上，「圍城」和「湯姆·瓊斯傳」可說是完全一致的。但後者畢竟是十八世紀的出產品，無結構之中還是有結構，而且有嚴密的結構。全書十八卷平分三部：第一部從湯姆出世起敍到他被逐止；第二部敍他從故鄉一路漂泊到倫敦去的情形；第三部敍他在倫敦的經歷，以及他的最後勝利。書中事實千頭萬緒，人物也十分繁富，一路看去，像是信手拈出，全無干係，到了結束處，總知道這些全有作用。原來這裏面包藏着無數的「埋伏」和「巧遇」，眞是萬派朝宗，一切路全通到羅馬去！這種傳奇性的手法固然很巧，給我們二十世紀的讀者看來，却未勉過於造作，有背「可能」（Possible）和「可靠」（Probable）的原則。比較起來，還是「圍城」接近人生。這書的結構非常簡單，只是把一位留學生從國外回來後的二年半裏面的經歷，挨着次序敍述出來，中間既無曲折，又無叫應，老派小說家慣用的那些解數，這兒一概豁免。書中的事實，除了方鴻漸和孫小姐同在火鋪裏夢魘那一幕有點神祕外，其餘全是太陽光底下習聞慣見的。可知作者的興趣並不在事實和結構上面，而是另有所在了。

說到這裏，我們纔眞正觸及錢鍾書和菲爾丁的根本相通之處。這兩位小說家有個共同的信念，便是題材無關緊要，要緊的是處理這題材的手腕。菲爾丁曾以牛肉爲喻，說明王公大人席上的牛肉或許和里巷賤人桌上的牛肉同出於一牛之身，然而前者能叫胃口頂饜的人動起食慾，而後者却使食慾最強的人倒盡胃口，可見分別全在調味、加料、和烹製的手腕上面。緊接着便來了下面的結論：「同樣的，精神食物的精美與否，關係於題材的要比關係於作家的藝術手腕的爲少。」（見「湯姆·瓊斯傳」第一卷第一章）這一番議論是爲了掩護本書中醜惡的題材而發的，由錢先生全部接受過去，而更變本加厲地運用起來。不久以前，有人在香港出版的「小說月刊」上評論「圍城」，說作

（下接第九面）

內政部登記證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臺灣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五號內一四一號
電話：（02）62432

訂閱價目
一次先收金圓三十元，照售價七五折記賬，款盡通知續繳

觀察航空版
華北航空版發行所：北平府右街李閣老胡同二號
台灣航空版發行所：

（華北航空版每冊售一元　台灣版每冊售台幣600元）

本埠分銷處　五洲書報社